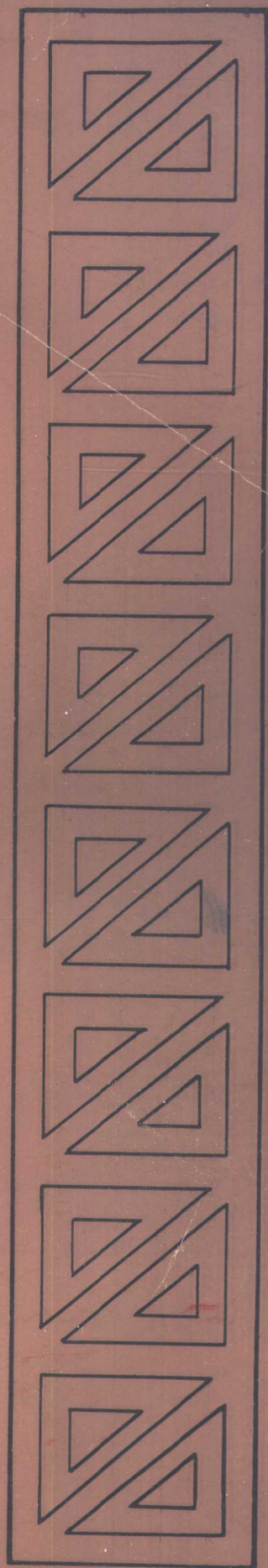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义



《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义》

目 录

代前言 衷心的祝愿

——在第三期中国现代史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彭 明 (1)
范文澜治史·····	李 新 (4)
一九八三年中国现代史研究述评·····	彭 明 (8)
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彭 明 (17)
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概况·····	来新夏 (24)
北洋军阀的兴衰·····	来新夏 (48)
西南军阀史·····	谢本书 (68)
广州国民政府·····	马菊英 (139)
国民军军史·····	王宗华 (183)
冯玉祥政治思想几次演变初探·····	张同新 (222)
国民二军的兴败·····	蒋相炎 (232)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	张静如 (247)
四大家族军事起家的历史社会背景·····	全慰天 (269)
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中国经济·····	金普森 (281)
从辛亥革命到和平解放的新疆·····	杨 策 (316)
汪精卫傀儡政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黄美真 张 云 (363)

衷 心 的 祝 愿

——在第三期中国现代史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兼班主任 彭 明

同志们：

今天，由中央教育部和中国现代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三期讲习班在祖国的西南著名的春城昆明，开学了。我自己的心情，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都是由衷的高兴！讲习班的领导小组委托我讲几句话。我想，应该首先指出的是，我们讲习班所以能够在这里如期开学，是和云南省的党、政、军、民、学各界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和具体负责筹备工作的云南大学的历史系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今天参加开学典礼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同志，他也是我们专门邀请的专家教师，又是黎澍会长的代表，所以他是一身而三任焉。他年事虽然较高，但不怕酷暑，不辞辛劳，不远数千里而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并给我们讲课，我们应该特别对他表示感谢和欢迎。他的第一课的题目是：《范文澜治史》。这是对范老这位第一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逝世十五周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我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最好的教育。

同志们，我们所以能够在这里如期开学，是和中央教育部的领导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记得我们在西安举办第一期讲习班的时候，完全“民办”，靠学员的学费“自给自足”。虽然也善始善终地办下来了，但可以说那三个月是困难重重，历尽艰辛。到去年在青岛办第二期讲习班的时候，就得到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了，精神上、物质上、人员上都给予很大支持，所以那一期是教育部和学会联合举办，也可以说是“民办公助”。那一期就办得比第一期更加完善了，虽然是两个月，但效果不但不减于第一期，而且有所超过。今年，我们在昆明办第三期讲习班，是在总结前两期的经验基础上办起来的，也是教育部和学会联合举办，但又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和特点，就是不收学费了，用开会一个月的形式，办班的经费由教育部完全包下来。（这是指原定的一百名学员讲的。后来各地同志纷纷来电来函要求增加，云南党史学会也要组织云南各地的一些同志参加。为了满足同志们的要求，增加了相当数目的学员。但教育部的经费有限，不可能把同志们的费用完全包下来。所以，对增加的这两部分学员，采取略微收一点学费的办法）这对我们讲习班是一个最大的支持，我们学会可以全力组织教学活动了，使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的学，无后顾之忧了。第一期是完全“民办”，第二期是“民办公助”，如果这样说可以的话，那么第三期就应是“公办民助”了。这个过程

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讲习班办理得是有成绩的。

我在第二期讲习班开学典礼上曾经以“再接再厉，越办越好”为题，与大家共勉。现在从以上三期讲习班的发展的特点来看，我们是不是“越办越好”呢？我看是这样的。不然，教育部就不会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支持了。

教育部所以对我们讲习班给予很大的关注和支持，是因为我们贯彻了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是因为我们在培训中国现代史师资上确实起到了一些辅助作用。

西安第一期讲习班，我们请到了十八位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在三个月内共授课二百六十学时，学员们说：“学习三个月，胜读一年书”。这话并没有夸张，因为三个月授课二百六十学时，相当于一般进修学习一年半的授课时间。

青岛第二期讲习班，结合暑期特点，虽然只有两个月，但我们也请了十位专家、学者分别讲了中国现代史的各种专题，总学时为二百一十四学时。学员同志们反映：“办讲习班是个好办法，五十多天，听讲二百学时，胜过两年离职进修”。又说：“通过内容丰富的十个专题的学习，基本解决了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教学的薄弱环节，对今后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到，在今后一两年的现代史的教学质量会有所提高”。因此同志们普遍要求，这样的讲习班必须一期一期的办下去，把全国现代史教员几年之中轮训一遍。我们的第三期讲习班，就是根据了大家的这些要求而办理的。这一期虽然只办一个月，但也请来了十位专家、学者，计划每周授课三十学时，总学时一百二十四。

我们的讲习班不仅扩大了学员的知识面，为现代史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而且通过办讲习班，也使中国现代史教师加强了联系，交流了经验。例如在青岛讲习班上，由班委会召开了两次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科研情况的交流会，有26个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的中国现代史教师参加，他们畅谈了各院校的教学、科研的情况和经验，热烈地讨论了现代史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提高现代史教学质量的设想。与会的同志们反映：这种交流会收获很大，交流了经验，学到了知识，加强了联系，建立了友谊。有的同志说：“这种交流会胜过拿着国家的钱，花上几个月时间，单独到各院校调查。可以说，现代史讲习班，本身就是具有全国水平的现代史教学与科研讨论会的性质的交流会。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教学和学术的交流，确实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在办讲习班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了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防止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在青岛办第二期讲习班，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我们是讲习班，而不是旅游团。看来这种强调，还是必要的。因为象西安、青岛这种旅游胜地，如不加强思想工作，很容易把讲习班办成旅游团。当然，必要的一些参观、访问对我们还是很有益处的。如在西安，我们组织了几次名胜古迹的访问，还爬了华山，特别是到延安进行了访问，大家感到收获很大。在青岛，我们也组织了几次名胜古迹的访问，大家也很满意。总之要分清主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不要陷于盲目、自流。古人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这是我们所赞许的，司马迁所以能写出“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一方面是由于他掌握了“石室金匱之书”，另一方面，也和他到处访问历史古迹，进行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散失旧闻”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提倡结合业务的学术旅行。如昆明便是一个充满历史古迹的城市，远的不说。“一二一”惨案四烈士的墓，就在我们住地后面，李、闻惨案，就发生前面不远的地方。由于我们加强了

思想工作，我们的两期学习班都没有发生大的事故。（象西安的华山，如不留心，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青岛的海滨游泳，如果不小心，也是会被大海吞没的），我们不仅未发生大的事故，而且同志们的身心健康，都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如青岛讲习班的同志们在早晚以及课余时间，学会了太极拳、午剑和气功，不少人学会了游泳。通过这些活动，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有的同志在两个月内体重增加了十斤。当然，我们的前两期讲习班，还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如知识更新、自学为主，还不是贯彻得很好，团结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加强。总之是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

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我们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课堂纪律、请假制度等等，希望大家共同遵守执行。学习班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教务、行政、后勤等一些事务工作还是很繁杂的。没有一定的制度保证，我们讲习班，是很难有生命力的。大家都来自高等院校，很多同志都有办学经验，我想这一点是会取得同志们的谅解的。

我在西安第一期讲习班时，曾一再强调“善始善终”、“好聚好散”。实践证明，这种强调不是多余的。我愿意再一次把这两句话提出来，和参加讲习班的同志们以及办班的工作人员共勉。

同志们！我们在昆明的第三期讲习班今天开学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这一期应该比第一期、第二期办得更好。要扬长补短，把原来的好传统、好经验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把过去的不足加以补充，把过去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我愿意重复青岛讲习班上说的那句话：“再接再厉、越办越好”。最后，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学习胜利！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范文澜治史

李 新

一、有的放矢，反对教条

众所周知，范老（文澜）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如斯大林所说，一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教条，机械地到处生搬硬套；另一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进行具体的分析，具体地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后一种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教导中国共产党人，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必须有的放矢，才是创造性的真马克思主义。范老治史正是依据这种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独立地去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而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现成的字句。正因为他能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历史之的，所以他的研究卓著成效，把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提高了。他对中国历史有不少的创见，看起来似乎与经典著作的条文不大吻合，但实际上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

以中国民族的形成为例。五十年代初，关于中国民族的形成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大多数同志以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为依据，拿他对民族四个特征的表述丝毫不变地来衡量中国民族发展的情况，结果就认为中国各民族（包括汉族）都没有达到民族的标准。特别是从经济关系来看，就连汉族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经济，因而也没有形成一个合格的民族。范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各国是从民族经济基础上形成民族国家的，因为每个国家都较小，所以经济关系很密切、很统一。汉族是一个大民族，自秦以后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其经济关系是逐渐才密切起来的。由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而且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经济。但不能因此就说它称不上一个民族。在西方，民族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在中国则不然。秦朝首先形成政治上集中统一的国家，然后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这不是连经济、文化和道德风俗都基本上统一了吗？从这时起，汉族不是就基本上具备了民族的四个特征了吗？因此范老认为，从秦朝开始，汉民族就基本上形成了。我没有参加这次争论，但我当时并不同意范老的意见。不过我觉得反对他的意见者，理由也不充分。三十年过去了，我现在认为，范老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的，而反对他的人（包括我这样不同意他的意见者），则多半是从定义出发，缺少事实根据。因此，范老关于秦以后汉民族就逐渐形成的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真理的。

二、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我国的政治气氛就极度紧张。在1958年的大跃进声中，我国

史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所谓史学革命。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随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更加剧了人们思想紧张的程度。这时的学术界到处都在“拔白旗、插红旗”，而史学界尤其严重。在这种风浪下面，推波助澜的人不少，曲学阿世的人也有。默不作声就很不容易了，还有谁敢于秉笔直书呢？

就在这段时间内，范老仍照常在看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他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完成第二编草稿后，工作继续进行，到五九年九月完成了隋、唐、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部分。”

（见第三编说明）他写隋炀帝“耀威”时有这么一段话：“隋炀帝要夸耀隋朝声威，使裴矩利诱西域诸国入朝。西域人有利可图，纷纷来洛阳，沿路郡县招待迎送，耗费极大，为害一直到隋亡。六一〇年，西域诸国使者齐集洛阳。隋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夏历）夜间，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设置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照耀同白昼，直到月底才停演。西域人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隋炀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服装华美，连卖菜人也用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邀请入店，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客人们不是痴人，口头上不免赞叹一番。市上树木都用帛缠饰，有人指帛问道，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市上人无话可对。隋朝与西域通商当然要双方有利，现在变成隋朝民众的大害。隋炀帝本人想求得声威，象丰都市缠树的帛那样，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请看，这是什么样的文字啊！这在当时是很可能身遭大祸的。但范老毫不顾忌，他秉笔直书，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写了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才真正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唐代刘知几所盛赞的史才、史学和史识，清代章学诚所推崇的史德，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同时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史学传统，在共产党人范文澜身上，得到了很好的改造和高度的发扬光大。“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让我们都把自己当时写的作品翻出来看一看，自觉地检查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整党，我们党员史学工作者很需要以范老为榜样，作一次对照检查，以增强党性和提高学术水平。

三、学识渊博 深入浅出

凡是读过《中国通史简编》的人，对范老学识的渊博，没有不称赞的。有不少历史上的疑难问题，经过他的考证研究，最后都弄清楚了。例如诸葛亮发明的所谓木牛流马，从前的人们把它说得神而又神，却都不知它是什么东西。范老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后，在书中明确地写道：“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原来似乎是神物，经范老一指点，便成了到处可见的俗物。木牛就是我在四川常见的鸡公车，流马就是我在北方常见的架子车（只不过后来改为两个胶皮轮罢了）。为了弄清这两件东西，范老不知读了多少书，他弄清楚以后，只用几百个字就写明白了。为了避免繁琐，他既不用引证，又不作注释。但读者一看，就了然于心，深信不疑。就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专家们，也都承认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从而钦佩他的博学——从一个治通史的学者对这样专门的问题，竟能研究得如此深透。又如有些迷信很深的佛教徒，把什么“黄龙汤”吹嘘为神药，能治百病。范老深入研究后指出：所谓“黄龙汤”，确如前人早已揭发，

不过是人的大便而已。范老对佛教这种迷信的无情批判，曾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因证据确凿，谁也不敢出来反驳。

中国古代有几段历史很复杂，例如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是很不容易叙述清楚的。范老对这几段复杂的历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书，由于研究既深入，表述又明白，所以人们读了这几段，不但不感到头绪纷繁，反而因为故事连篇，引起极大的兴趣。写历史书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颇不容易。只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高超的表达力相结合，才能做到如此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这方面范老也是我们的典范。

四、史论兼长，风格特殊

范老本来是治经学的，他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熟悉，尤其对儒家的经传注疏，了如指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马列著作用力钻研，很有心得。他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注重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去解决中国的历史和实际问题。他一直坚持延安当年规定的每天两小时理论学习制度，从不间断。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是很有修养的。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能把文化思想部份写得非常出色。就是对于文艺作家，他也很注意其哲学思想的反映。例如他认为李白的诗，主要反映了道家的思想；杜甫的诗主要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而王维的诗则主要反映了佛家的思想。

范老是从四十年代起才专门从事历史著述的。他由治经而治史，深知理论与历史的不同特点，所以他写理论时用论笔，注重讲道理；写历史时用史笔，注重摆事实。当然写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总要有评论。对此，范老主张夹叙夹议，先叙后议，以叙为主。我认为写历史著作，范老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是完全符合历史科学的特点的。历史著作要求作者通过史实来表达他的观点，而不可采取什么“以论带史”一类的方法。这正如文艺作品要求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一样，绝不可以标语口号来代替艺术形象。

范老的史笔运用得极为纯熟，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把纷繁复杂的历史叙述得十分清楚，有如一个亲历者在和你讲故事一样。他叙述到一定的地方总会适时地加以评论，而这些评论是那样的简练却又那样的精辟，真是一字千钧，发人深省。

范老的文学根底很深，这从他注释的《文心雕龙》可以看出。但他写历史不尚文采，而以质朴见长。由于范老对理论、历史和文学都有很高深的造诣，而又掌握住了它们不同的特点，所以范老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具有特殊的风格。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范文澜的手笔，而非他人所能代劳。他虽然也有助手（并且都是些很有学识的助手），但他的著作总是浑然一体，不见斧凿的痕迹。因为只要是他署名的作品，都是经过他一丝不苟地反复推敲然后才定稿发表的。范老这种严肃认真的学风很值得发扬。

五、坐冷板凳，不说空话

范老一生好学，手不释卷。他没有任何嗜好，只是酷爱读书。这种书看疲倦了，换另一种再看，就算是休息。他常以欧阳修的“三上”精神自勉。欧阳修于马上、枕上和厕上都离不开书，所以成为宋代著名的大学问家。

对于研究历史，范老特别强调用功，主张下苦功夫，坐冷板凳。他常说：搞历史和搞文学不一样。文学家，特别是诗人，没有才华是不成的。而历史工作者，只要肯用功就一定会成就。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是天才，又肯用功，其成就必定很大；即使是中等资才，也是下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收获。因此他提倡历史工作者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得坐十年，切不可三心二意，一曝十寒。他说：既然搞学问，就别想做官。想做官就别进研究所。你想做官却来到研究所，岂不是找错了门？我这个研究所总共才一百多人，跟一连军队差不多，我这个所长不过连长罢了，想当官何必到这里来呢？范老这些话，很有风趣，也很浅显，却是至理名言，完全合乎治学尤其是治史的规律。谁如果不按这个规律办事，他就一定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范老认为写历史著作，一定要靠史实，绝不可说空话。在196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的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篇《反对放空炮》的讲话，随后整理成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这篇文章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风波。范老为人是很谦虚的，不但能认错，而且知错就改。但对这篇文章，他始终不承认有错。

南京大学的韩儒林教授，对范老治史的态度和方法很赞赏，因为他治史的路子基本上和范老是相同的。他特地把范老的治史方法集成两句话，当作座右铭。彭明同志得知后告诉了我。为了使这两句话对仗工整一些，我大胆地改动了两个字，使它成了下面这样一副联语：“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彭明同志后来把这副联语写进了他《五四运动史》的前言中。我本想什么时候见到韩儒林教授，就向他致歉，因为我未征求他的意见就改动了集成的警句。谁知我还没有见到他，他就继范老之后而与世长辞了！史学界失去了这么两位长期坐冷板凳、不说空话因而硕果累累的实干家，该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但是我相信，他们是后继有人的。他们作为历史学家，不但找到了治史的规律。而且提供了作人的典范，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后继者一定会学习他们的榜样，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攀登上更高的峰顶。

1984年6月为范文澜逝世十五周年而作

一九八三年中国现代史研究述评

彭 明

在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内，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中，也有新的进展。

这一年内，有两个重大的纪念日，一个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个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围绕着两个大的纪念日，学术界展开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发表了许多专著和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本年内均各开了年会（学术讨论会）。中国现代史学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史体系座谈会”，促进了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此外，在本年内各种学术性刊物和资料性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的论文和资料，均有相当数量。各地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比较有分量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专著。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

近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弄清了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书名是在什么时候等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活动中，许多报刊、学报等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这方面论文，有的讲得较为系统，有的讲的较为专门。这些论文都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对大量资料进行了收集、排比、研究等工作。如姜义华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载《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邱军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高放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肖超然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介》（以上两文已编入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出版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等，都有一定的分量。北京图书馆的同志还根据馆藏资料举办了展览会，并在报纸上发表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史之“最”》（《北京日报》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等文，介绍了目前查到的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期刊，书籍、文章、图片等，简明扼要，在群众中很受重视。

但是，在宣传马克思学说早期在中国出现的文章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材料不确，一是评价太高。有的文章把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和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言论，当作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把这些言论在中国报刊上的发表，当作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的文章，为了追求效果，引人注目，还特意标出“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第一本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等等。而这些所谓“第一个”，他们并非在主观上把马克思学说当作正确学说来传播；而在客观上，马克思学说也并没有因此而传播开来。因此，有的同志对一些提法表示疑义，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究竟应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刘桂生、钱逊合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可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这篇文章指出，列宁以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由普列汉诺夫一八八三年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算起。可是，在这之前四十年，即一八四三年，俄国激进民主主义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已经有人介绍恩格斯的小册子《谢林与天意》，有些地方还逐字译出。如果按照我们有些同志那种说法，岂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不应从一八八三年开始，而应以一八四三年开始，第一个传播者不是普列汉诺夫，而是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在用比较法作了一些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按照列宁那样严格的标准，我们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围绕着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出现，从年初开始，各种社会科学刊物，都陆续发表带有纪念性又有研究性的论文。十一月五日——十二日在南宁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收到论文三百多篇。接着，在长沙又召开了全国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新闻学学术讨论会，全国党校党史、党的建设学术讨论会；各省市地方的各种学会，也都分别召开了各种专业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所有这些学术活动，都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对全国人民全面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教育意义。

在毛泽东诞辰前夕，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选集》共收书信三百七十二封，是从现已收集到的毛泽东的一千五百多封书信和约二百件具有书信性质和形式的电报、批示中送出的。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批书信有论及重要的方针、政策的信，也有许多和同志、朋友、亲属、故旧等个人交往的信。涉及方面较广，理论、学术观点，思想修养和工作，学习方法，都有所论述。由于是书信形式，因此大都不是长篇泛论，而是结合问题，具体分析。加以作者用语生动，行文流畅，量浅意深，纸短情长。读来朗朗上口，闭目发人深思。因此，对读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批书信，是研究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文献。对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冯蕙为此书出版所写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一文（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版），可以说是一个全书的提要，对于没有力量通读全书的读者来说，很有益处。

一九八三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注释书。它遵循党中央关于《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著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对《历史

决议》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史实，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说明。例如关于《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的主要代表》等条目的说明，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见《注释本》第一三四——一五〇页）

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的过程，《注释本》也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第四七九——四八〇页）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以比较完备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并用这个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一九四一年三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以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曾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并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作了高度的评价。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十九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从正面的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

但是，毛泽东本人是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的。“七大”也没有这样提，一九四八年，吴玉章在河北正定任华北大学校长的时候，曾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提出是否可以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注释本》第四八一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三〇三页）

（三）关于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研究

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持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至本年十一月已经出齐十卷，至本年年底又出版了十一、十二两卷，正在印刷中的尚有三卷。

这套大型丛书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从已经出版的前十卷《中共党史人物传》来看，计收入一百零五位著名党史人物的传

记。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的创始人和著名人物李大钊、何叔衡、王烬美、蔡和森、向警予、苏兆征、彭湃、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等；有建国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任弼时、贺龙、邓子恢等；有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刘志丹、谢子长、贺锦斋、赵博生、董振堂、李明瑞、吴焕先、彭雪枫、杨靖宇等；有被反动派杀害的著名先烈陈潭秋、毛泽民、施洋、顾正红等；有受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吴玉章等；有科学文化战线上的先锋战士和著名学者邹韬奋、吴晗等；还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等。

从传记作者来看，有社会科学和党史方面的老专家，也有年轻的甚至是业余的党史工作者。多数作者，则是中年的党史工作者。这些作者为传记的写作都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许多传记，往往是由作者化上一两年的时间，查考很多资料，跑了很多地方，跋山涉水，沿着传主的足迹，访问了许多直接间接有关的知情人，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的。因此，这些传记，每篇都有一定的价值，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填补了党史和现代史上的一些空白点。

当然，这些传记编写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如有的传记写得比较冗长、粗糙，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人物特点不够突出，文字也缺乏生动，等等。研究会准备把这些传记作为征集意见稿公开发行，将来再不断修订，以便形成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准确的有历史价值的参考丛书。

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召开了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同时又收到各地交来的人物传记（讨论稿）一百八十余篇。该会现正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修订规划，抓紧编审工作，计划到一九八四年底，再编出五卷，共编成二十卷。以后每年计划编出七、八卷，争取到一九八八年完成五十卷的编辑工作。

除《中共党史人物传》这套丛书外，人民出版社及各地方出版社也都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革命烈士传记和人物传记。这些都对广大读者起着良好的教育作用，也为中共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中顾委常委、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王首道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党史人物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讲话，对党史人物研究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他指出：“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在我们研究者的笔下，需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超越时代的历史人物。‘四人帮’时期那种盲目夸大、别有用心的捧场，说抬谁，一下子就上了天，是超人，是神人；说贬谁，一下子就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无是处，无地自容。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客观地、辩证地、有分析地写历史人物，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党史人物研究者的美德。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王首道：《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

（四）关于中国现代史起于何时的讨论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和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本年内又继续展开了讨论。

当前，国内外史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一的标准，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应起于何时的意见，很不一致。主要有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和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的两种意见。但也有主张从辛亥革命开始、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开始、从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从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开始的种种意见。

从五十年代开始，荣孟源、李新等便提出了按社会形态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意见，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属于中国近代史，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开始的标志。这种意见，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如胡绳在近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中说：“按社会的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李侃在为《近代史研究》改刊为双月刊所写的《近代史研究琐语》中，也再次肯定，《近代史》的上下限为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年的意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但是，这种意见，长期以来（自五十年代）为许多从事党史、革命史或从党史、革命史转入现代史教学的同志所反对，他们认为仍应以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一次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专题的讨论会。参加会的有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教师四十余人，与会者交流了各地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编写讲义的检验，并对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研究对象、分期、学科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具体情况，会议委托成汉昌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讨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六期）作了详细的报道。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各种意见并存，但大部分人仍主张以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有的提出必须从当前国内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一方面，正式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已有三十年时间，全国大中学校相当多的科研单位和已出版的大量教材、著作都采用这一观点。新中国培养的一大批现代史工作者的队伍已初步形成，他们的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主要还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这一领域的全面开发，从近几年才真正开始进入正轨。另一方面，对于建国后的三十年，作为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积累过程。如果把一九四九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始，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以致实际取消或削弱了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呢？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成汉昌：《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讨论述评》）

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研究机关的同志，大都同意中国现代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意见。而从事高等院校教学的同志，则从教学实际出发，反对这一意见。根据作者所接触的教师来看，讲现代史多年的同志认为往上再去教“五四”以前的历史，或者专门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都有困难。长期从事近代史教学的同志，认为让他们去从事“五四”以后历史的教学，也有困难。由此看来，双方意见的统一，还要有一个过程。因为它不仅是一

个理论问题，而且牵扯到课程设置及教材、教师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只要继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双方的意见会逐步接近统一的，实际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

这次会议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分期、学科特点等问题也比较充分地交换了意见。由于掌握标准不同，对分期的认识也不一致，共提出四种分期法。大家认为：“各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存在不够成熟、不够完备的方面。作为历史研究，可以各持己见，进一步深入讨论，但作为教学，则应有一个比较一致和稳定的意见。”

（五）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专著和回忆录

在本年内，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专著和资料汇编的书籍中，有一本书值得加以介绍，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李新、陈铁健主编，由众多同志集体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的第一卷：《伟大的开端》（1919—1923）。

这部书是胡乔木同志倡议，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开始编写的，要求是写成一部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全书计划出版十四卷，现在与读者见面的是第一卷。

历史长编曾是我国历史书体裁一种，它的特点是按时间把所有有关原始资料加以排比，为研究和编写专著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如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这种题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也大量地引用甚至照录原始材料，把尽可能找到的材料都按时间的顺序揭示出来，因此，它带有长编的性质。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长编，不是简单的排比，而有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包括必要的考证），虽讨论的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例甚小。因此，它是一部“带长编性的著作”。这种题材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创举。它既把大量的资料精华都尽可能地勾划出来，供给研究者参考；又有一种观点贯串在材料之中，做到观点材料的统一，像有一条红线把许多散乱的珠子贯串起来，而不致使读者堕入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而不知所向。因此它的实用价值很大。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特别是筹备阶段的这一段历史，出版的教科书、讲义、教材，种类可谓不少，出版的资料也具有了相当的数量，但真正把这一段的历史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的尚不多见。这本《伟大的开端》比较妥善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它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约十万字），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酝酿、座谈到建立组织的经过、人员的变幻离合和所进行的活动，以及“一大”召开的逐日情况，交待得十分详尽，条理是清楚的，史实是令人信服的。

当然，这样一部由集体创作的体裁新颖的尝试，并不能说它是已经十分完善的了。比如说各章，特别是今后各卷的平衡问题（从内容到形式的比较一致），以及材料的进一步考证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此外在具体材料上弄错的地方，也有若干处。但这些，都是不难在今后陆续编写和再版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总之，《伟大的开端》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看到它的以后各卷的陆续出版。

本年内，各地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个人的或专题的回忆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惠僧回忆录》，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淮海战役亲历记》等，都是值得一读的。

《包惠僧回忆录》，包括《回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二七回忆录》、《回忆大革命时代》、《人物回忆》等几个部分，并附有作者的《自传》。其中《回忆大革命时代》是作者五十年代的遗稿，这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作者曾在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党军第三团党代表，参加过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战役及第二次东征。接着又任过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选过国民党二大代表，亲自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变。武汉政府时期，他曾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主任等职，也和西北军冯玉祥的代表建立过联系，并准备参加西北军的工作。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所见所闻均反映在回忆录中。有的部分，如黄埔军校学生中两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平定杨、刘和第二次东征的情况、“三二〇”事变和夏斗寅叛变前后的情况等回忆，都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顾维钧回忆录》是中国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将近五十年外交生涯的回忆。顾自一九一二年自美国回后，先在袁世凯政府中从事外交活动，此后在北洋历届政府担任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等国公使。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一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担任过国际联盟行政委员。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先后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及驻法、英、美大使，驻国联及联合国代表。一九五六年转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直至退休（六十年代）。

这部回忆录英文打字原稿共一万一千页，译成中文约五百万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先后有五位学者根据顾的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及信函、文件，经过录音、编写、核实、校正、历时十七年之久，这部巨著始告完成。中文稿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回忆录》的缩微胶卷翻译的。中译本拟分订十二册，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本年内，我们看到的是已经问世的第一分册。

从第一分册看来，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许多情况是为一般书籍和文字资料所未记载的。有些情节的描述，还相当生动有趣。例如，袁世凯和顾维钧在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的一次谈话，顾回忆说：“他（指袁）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

（第九十二页）这段话生动地说明袁世凯不懂得也不准备实行共和，因此他强奸民意，把中华民国一步步引向中华帝国，不是偶然的。

再如，顾维钧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回忆了在拒签和约中五四群众运动所给予代表团的压力和影响，他说：“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部每日必往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第二〇六——二〇七页）当时代表团的团长是陆征祥，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他曾参加谈判和签订二十一条，又因他在洪宪帝制时任过国务卿，怕成为众矢之的，到巴黎不久就借口养病在医院中躲起来，代表团的秘

书长岳昭燊则被看作陆的亲信和代理人，而群众认为他们都是赞成签约的人，必须给他们以压力。顾维钧曾回忆了巴黎和约签字日（六月二十八日）前夕的一个生动场面：“晚饭之后，我（指顾本人）去看陆总长，发现岳（昭燊）也在。我们一道交谈了几个小时。岳先生后来起身向外交总长告辞，要返回巴黎。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在当时看来非常可怕的事情。岳先生在走后二、三分钟又匆匆地折了回来。他脸色苍白，对外交总长说，他在医院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讲，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很多人是学生，也有一些华侨商人。他们拦住了他，请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是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成是陆总长的心腹，并认为陆不顾代表团其他人的劝阻，已经决定签字。据岳先生讲，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女学生甚至当真在她大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跑了回来。他说，他还是在医院里过夜为宜。……”（第二〇七页）这个材料，证以当时各种报导，还是可信的。

总之，这部《回忆录》所提供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希望以下各册能够早日陆续问世。

《淮海战役回忆录》是原国民党将领在淮海战役中亲身经历的回忆。这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淮海战役纪念馆共同工作了很长时间。原稿二百五十万字，现在压缩到五十万字。这本书，对国民党统帅部的内部矛盾，对国民党各兵团被歼灭，包括何基沣、张克侠将军起义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描述。书末附有《国民党军大事记》、《淮海战役国民党徐州“剿总”参战部队序列表》、《国民党徐州“剿总”直辖部队及有关单位表》、《淮海战役国民党参战和被歼部队军、师番号表》，并附有淮海战役各个阶段的要图。通过这本书，对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败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这本书说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个人的片断回忆，转到能够比较系统地反映一个历史事件的专题整理。如果能把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资料，都这样整理出来，推而广之，继续往上搞，把一战、二战、抗战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整理出一部或几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回忆资料，那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就是很大的贡献了。

（六）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论文和资料

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些专业性的刊物上，如《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均发表了大量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论文，推动了问题的研究和深入。

《党史研究》在本年（一九八三年）内发表研究论文共五十四篇，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达三十七篇，其中：一战时期十一篇；二战时期十四篇；抗战时期十篇；解放战争时期二篇。《近代史研究》在本年内共发表论文七十篇左右，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达三十余篇，其中：一战时期九篇；二战时期十七篇；抗战时期五篇；三战时期三篇。

在这一年内，过去很少有人谈论的党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陆续有论文发表。如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与党的策略问题等，在《党史研究》的一些文章中受到了重视。（见《党史研